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2)02-0019-(06)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与选择

叶 江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过程,它是一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空前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认清本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主动地接受世界市场的运行机制,按世界市场的规则办事,摒弃传统的“国家迷信”,不断地根据世界的变化调整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且加强与世界市场中所有行为体的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潮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历史潮流;宏观经济调控

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似乎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研究中的显学。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正在持续不断地扩展,因此即使研究经济全球化已成显学,也依然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继续广泛和深入地作考察和研究。本文拟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经济全球化作些新的探索,在经济全球化对我们的挑战,以及我们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何选择等问题上做些新的分析,提出一些不太成熟但或许有些新意的看法,以期得到学术界同行的批评指正。

—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在二战后的高新科技推动下,通过全球性的跨国直接投资和世界性金融市场的作用,不断实现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的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深受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而同样显示出一体化的倾向。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世界经济在生产、金融乃至知识等深层次经济结构上的不断一体化,因此,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行为对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

响,同时,后者又反过来对前者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跨越了政治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的边界,超越了自资本来到世间后所形成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控制,从而使世界市场不断地在深层次上整合,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市场。在不断整合的世界市场中,全球的产品、服务和资本不仅通过国际贸易、更重要的是通过国际投资和国际化生产高速度大容量地跨国界流动,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也因此而大大地越出民族国家的疆界。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过程,它是一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的历史潮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时候,世界市场主要通过世界性的贸易把世界联系在一起。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收稿日期:2001-02-10

作者简介:叶 江(1955-),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

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市场不仅通过世界贸易的高速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国际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以及生产的国际分工把世界从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甚至知识结构和文化结构等深层次上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自身内在逻辑就是世界市场的力量在全球性生产结构和世界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展中日益增大,以致极大地降低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使得建立有效的贸易壁垒成为过去式,而新的技术和新的金融手段使各国政府难以控制金融的跨国流通。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之下,经济资源不再被限于国界之内流动,而是冲破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世界经济因此得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因为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给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资金、更低的成本、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广阔的市场。正因为如此,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速发展的机遇。

但是,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空前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市场的力量日益强大,而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则往往力不从心,由此,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介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底子薄,国家的经济调控能力本来就弱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每当世界市场失灵,受其负面影响最重的无疑是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家,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拉大。由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场革命,而是世界经济在国际经济秩序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的某种新发展,因此,由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发展的不平衡和机会的不均等等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继续存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所加强。由于经济全球化通过对世界市场的深层次整合而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因此,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和机会的不均不仅主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利,而且对发达国家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以至最终会影响全球的发展进程。

最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而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却依然是分裂的民族国家体系,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国际体系在总体上仍是无序的,因此,全球性问题往往因得不到权威性的全球性机构的处理而恶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毒品问

题,以及难民问题都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单个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很难独自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然而,迄今为止,建立超越国家、面向世界市场经济机制的全球性权威政治机构依然只是某种理想境界,世界政治体系从本质上而言仍然是分裂而无序的体系,由此,问题的全球化而解决问题的机制依然分裂化对人类构成巨大的挑战。^②

二

面临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客观现实,我们应该作何反应和选择呢?躲避肯定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潮流。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市场的日益整合,使世界经济从更深的层次上相互联结,而科学技术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又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完全超乎于个人乃至国家控制的。由此可见,面对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有意识地去避免这一过程绝对不可能。实际上,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不应该是要不要介入经济全球化,而应该是怎么介入经济全球化。这也就是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实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方法和手段去抓住经济全球化所给予的机遇,迎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将世界在深层次上整合的过程,但是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主要行为者的每个国家在这一不断整合的世界中的地位却是互不相同的,这也就意味着对每个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所给予的机遇和挑战都是既具有共性又充满个性的。正因为如此,处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任何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首先所必须注意的就是认清本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因为只有明确了自身的地位才能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给本国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特点,从而能进一步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反应,提出合适的政策。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子指出:“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孙子是谈兵法,但对我们今天如何应付全球化的挑战却同样有启发意义。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也就是明确我们的整体经济实力的大小,然后再由此出发决定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攻守”,从而最终能够做到“百战不殆”。

1999年美国《外交季刊》9—10月号发表了题名《中国重要吗?》的文章。作者从其保守的国际政治经

济观出发,一反过去某些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的观点,提出中国是一个“被夸大的国家”,因为“中国至多是全球经济中一个较次要的部分”,应该肯定,该文作者反对“中国威胁论”,但是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视中国为无足轻重的国家,并提出,西方国家只有把中国视为类似于巴西或印度那样等级的国家,才能制订出连贯和长期的对华政策。^③由于该文充满着对中国的偏见,因此文章的观点很明显是大失偏颇的。但是,这篇文章似乎也从某个方面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对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一客观的认识。

根据比较可靠的统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高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6180亿美元)和澳大利亚(3940亿美元),但是比美国(80800亿美元),日本(41930亿美元),英国(10992亿美元),法国(13111亿美元),德国(18448亿美元),意大利(11819亿美元)等都要低,其中特别是与美国相比,差距近9倍。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740美元,不仅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低许多,而且还低于菲律宾(1118美元)和印度尼西亚(1066美元)。^④从上述的一系列数字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既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已与英、意等西方大国十分接近,但又不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目前仍处于新兴市场阶段。

事实上,虽然经济全球化目前正在不断深入地发展,但是自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却至今尚未有本质性的变化。现代世界体系迄今依然由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相互结合而成。尽管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市场不断地在更深和更广的层面上整合,生产要素和产品跨国界流动的速度和数量不断加快和加大,整个世界因此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并不是平等或公平的联系,今日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或相互依存是有主次和高下之分的。毋庸讳言,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始终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尤其是处于半边缘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因经济全球化的作用而正在不断地增加影响。

作为新兴市场的一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正在上升,经济全球化少了中国的参与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反之作为新兴市场中的大国,中国也必然要参与经济全球化。然而,由于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迄今并不处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对世界

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自然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实力尚未达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的程度。客观的现实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处在“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甚至“不若则能避之”的地位。

正是因为中国既是一个经济力量在不断上升的大国,但又是一个并不处于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所以经济全球化所能给予我们的机遇更大、更多,但同时对我们的挑战也更严峻、更重大。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不断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能够比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易于获得更多的资金、更新的技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并且通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中国对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都有极大的吸引力,众多的跨国公司都希望能在中国找到发展的机会,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在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举行,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⑤《财富》论坛的规模是历届论坛中最大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有60家参加会议,300多位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以及一些政界和经济界的名人欣然与会,由此可见,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由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所面临的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也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更为严峻。

首先,在不断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受世界市场不确定和不稳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会随着融入世界市场程度的加深而日益困难,而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一旦世界市场失灵,中国所可能受到的影响必然要更大。二是因为中国目前并不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虽然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对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力却仍然不足。中国至今没有能够参与对世界经济运作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七国中的加拿大,尽管目前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经济总产值为4500亿美元的俄罗斯却能参与其中。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既有分量又影响力不足的实际地位决定了世界经济在全球化过程所发生的震荡会更严重地影响中国。三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虽然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就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最终已经确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应当承认我们的市场化程度迄今依然不高,尤其是与世界市场的接轨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由于中国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恰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

制同步,因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乃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等对我们的挑战就更大,因为自身机制的不完善会极大地影响处理这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其次,但并不是次要的严峻挑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发展的不平衡和机会的不均等等都有可能拉大和加强,而且具有因赶不上经济全球化不断变化的节奏而被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的可能。由于在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并不处于有利的地位,加之中国是在改革的同时实施开放的,也就是中国是在建立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往往会导致国内机制变革的某种停顿。然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形势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国家,只有不停顿地不断地适应于变万化的世界市场,才有可能抓住机遇,跟上潮流。否则中心和边缘、半边缘的差距只会拉得更大。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跨国公司通常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设置工厂,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和进行全球化的经营和管理的。跨国公司的这种以全世界为“工厂”,以各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车间”的经营行为需要各接受直接投资的国家通过不断改善本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相配合的。对那些市场经济机制比较完备的国家而言,适应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行为并不难,这也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重点依然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然而,对市场机制不完备,或正在不断完备自身市场机制的国家而言,对跨国公司的适应性就比较差,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生动荡的时候就更不易于适应,有时甚至会走向极端,即停止对自身内在经济机制实行调整,拒绝走经济国际化的道路,乃至最终彻底排斥跨国公司的投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不断地失去经济全球化所给予的机遇,以至被完全甩出世界经济的主流。实际上目前一些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中的国家已经几乎完全被逐出国际经济循环圈而成为赤贫国家。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程度而言,我们似乎不太可能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但是,这样的威胁并非完全不存在。

三

孙子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庙算者,即在国家层面上的预测、算计、谋划、决策和作出各种安排。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我们只有不断地加强孙子所提出的庙算,全面地认识形势,正确地预测未来,提出符合本国实际的政策,作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安排,才

能不被经济全球化的巨浪所击倒,才能不被推入全球经济的边缘,才能真正成为不断发展着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胜者。

就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而言,首先需要全面庙算的就是对世界市场力量的估价以及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和姿态对待经济全球化作用下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至今已有三四百年,但是世界市场在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等深层次上的整合,则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形成的。世界市场的深层次整合一方面对以国家为主体的传统国内市场形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则极大地加强了世界市场在世界经济运作中的力量。在世界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世界资本不断地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各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因此日益紧密,生产、流通乃至消费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因此,为了适应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各国的经济自觉或不自觉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总之,世界市场已经成为左右各国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力量,各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与否,就根本而言是在于是否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世界市场的变化。

对我们而言,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市场力量不断强大的客观现实,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主动积极地融入世界市场,而不是被动消极地等待世界市场的冲击。所谓主动积极融入世界市场就是有计划、有准备地将本国的经济运作体制与世界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接轨,并且严格地按世界市场的规则办事。当然应当肯定,迄今为止的世界市场运作机制和规则是对参与世界经济的后来者(主要为第三世界国家)极不公平的,因此,作为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后来者,我们希望改变不公平的世界市场运作机制和规则,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不首先融入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拥有修改世界市场运行规则的发言权,更不可能凭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只有主动地接受世界市场不公平的运行机制的现实,并且尽可能地熟悉世界市场的运作规则和按世界市场的规则办事,才有可能参与对不公平的世界市场规则的修改,乃至最终在自己成为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强者之后,将建立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想付诸实现。

为了不陷入边缘化的窘境,必须下决心自觉主动地融入世界市场,而融入世界市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不能以姓“社”还是姓“资”来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前提。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⑨今天虽然我们已经确立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路线和方针,但是,由于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还有待于较长时间的努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搁置姓“资”和姓“社”问题,坚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今天,只有让市场充分地发挥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真正确立起来,并且能够经受长时期的考验,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世界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前所未有地整合,而这种整合恰恰是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也能为社会主义利用的。如果我们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仍然不断地担心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也就是总是要探究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那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永远是一句空话。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论什么样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终究要与世界市场紧密接轨,由此,在世界市场的庞大体系中坚持作姓“资”还是姓“社”的选择不仅无意义,而且很危险。

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摒弃传统的“国家迷信”。过去我们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行政机构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有计划的控制。于是,“国家迷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某种主导思想。在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时,我们曾经盲目地相信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绝对作用和能力,彻底地否认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和调节作用,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结果干了许多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蠢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腾飞。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展开,我们终于认识到,“国家迷信”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等于国有制的支配地位加计划经济。但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期,出于政治的、政策的,乃至认识水平的种种原因,我们在否定“斯大林模式”的同时,并没有迅速地完全放弃“国家迷信”,比如坚持认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坚持相信国家在经济运作中的绝对力量等。

然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告诉我们,随着世界市场在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日益强大的作用下不断地将整个世界在更深的层次上相联结,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国家对经济运作控制力的下降,因此不论什么样的国家,如果继续迷信国家的力量,就有可能阻碍自身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经过20年的改革和开放,并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我们终于名正言顺地提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通过修宪,将这样的提法放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十分雄辩地证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走出了“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宪法的如此修改,我们从法理上将我国的经济体制与世界市场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更多地接受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更为理性地引入间接投资提供了国内的法律保障。

当然,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否定“国家迷信”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世界市场始终充满风险和存在失灵的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场的风险不是下降了,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变得更大,世界市场失灵所造成的损失也因此更严重,近年来拉美的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风暴都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市场的本质是无序的,而在世界市场之上迄今尚没有能够对之进行调控的全球性上层建筑,因此国家依然有责任尽可能地承担起经济运作“监管人”的重任。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在下降。正因为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是:国家的能力和作用不断地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但世界市场的无序性又同时需要国家继续进行宏观的经济调控,所以,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放弃“国家迷信”但又不能否定国家的作用。由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这种充满辩证逻辑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无疑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根据世界的变化调整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使之能真正地起正面的作用。

孙子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⑧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对任何国家而言,事实上不存在任何永恒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必须根据世界的经济形势,即世界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不能适应世界市场的残酷竞争,以致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落伍者和失败者。当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政策的变化还必须同时从本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有理有节地实施。这也就是说,在某种时期对某个国家是适当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国家也许就不适当。比如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亚洲经济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就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的政策选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98年和199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高于7%。当然随着亚洲经济的逐渐复苏,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整合,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速,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必须也必然要根据变化着的世界经济而产生新的变化。

根据世界市场的不断变化而保持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仅是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而且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运作是以价值规律为决定性因素的,因此获取利润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任何企业的不二法门。为了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在世界市

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公司企业不论大小往往都以眼前利益为重而不重视全球的长远利益,其中特别是不重视全球长远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由于不论世界市场如何在深度和广度上整合都不可能自动地节制企业追逐利润的行为而使之注意保护和生态,因此,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平衡遭破坏的问题。更有甚者,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对全球环境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常常将在发达国家中受限制的污染企业原封不动地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持续性遭到严重的影响,同时全球的环境和生态则继续整体性地恶化。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运用市场之外的政治力量来调控企业的行为,通过行政手段来保护和生态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在融入世界市场中所必须十分注意的。

然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毕竟对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同时当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完全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因此在世界市场经济的无序发展中,单个国家的调控和监管作用虽然仍很重要,但往往会失控。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就必须加强多边合作,其中包括在经济领域和环境领域的有效合作,但同时更需要政治领域内实现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政治的主流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和平与发展的特征,虽然由于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间的矛盾继续存在,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依然很激烈。然而在世界市场不断一体化的运作中,世界经济的发展的规制确实已不再表现为传统的“零和”,而是由“双赢”取而代之。由此,在经济全球化的

环境中,加强合作是各参与世界市场经济运作国家的必然选择。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并且在处理全球性问题,其中特别是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选择合作应该是我们确立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同时我们应该懂得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有效合作是建立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的,因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是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提。当然,我们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所作的一切妥协和让步必须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妥协和让步的结果应该是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

注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版。
- ②有关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请参阅以下拙文:《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世界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 期,第 11—15 页。《试论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观察》1998 年第 1 期,第 12—16 页。《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政治新格局》《探索与争鸣》1998 年第 4 期,第 36—38 页。《融入全球化,直面风险》《探索与争鸣》1998 年第 11 期,第 11—13 页。《全球化的同时,贫困扩散》《探索与争鸣》1999 年第 7 期,第 37—39 页。
- ③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rom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 24—36.
- ④文内数据参见《1998—1999 年欧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95 页,以及《光明日报》1999 年 9 月 10 日第四版。
-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2 页。
- ⑥文内所引的孙子语录均参见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子校释》1990 年版。

New Analysi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YE Jiang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n objective process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a great historical trend that is independent of man's will. While bringing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lso brings serious challenges to every country, especially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acing opportunities and confronting challenges, we must recognize our own status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nscientiously accept the mechanism governing the performance of world market, and act according to its rules and regulations. We have to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blind faith in state" and constantly adjust our macro economic policy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world market. Only thus, are we able to catch up with the historical tide and remain invincible.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orld market,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责任编辑:王亚仑)